

刊首语

各位读者朋友，久违了！回顾上一期杂志，居然也是六月刊行，只是时光已过整整一年。

这一年中，教育政策有了诸多调整，但基层学校的教育状况似乎更令人忧虑。“素质教育”已经提出十多年，然而，无论是教师或者教育专家都难以对“素质”进行清晰的定义，更勿论课堂操作。“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被狭义地替代为小组教学、快乐教学、老师不讲学生多讲等僵化的准则，并且无视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学生的不同基础和条件，把城市中上层儿童的学习方式强加于全体学生，实质变成了“以某一部分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

所谓“素质教育”也丝毫未改变考试对儿童和家庭的折磨。校长们向教育部反映：“幼儿园里已经暗无天日了！”北京的“小升初”难题“已经把中国孩子搞死在起跑线上了！（北京家长语）”课外活动、特长发展本应是学科教学外对儿童生活和成长经验的补充。而在“素质考试”的畸形结构下，儿童所有的活动——学科与非学科的——都成为了潜在的考试项目，都成为竞争的筹码。在北京白热化的学校竞争下，据说钢琴十级证书已经不算稀奇，进不了金字招牌的中学了。“素质教育”推行的结果，并没有如其所愿地祛除考试的魔咒；相反，它把考试的范围和难度大大地扩展到学校教育之外的各种领域中，把儿童所有的学习经历都变质成为了功利性的强迫性的活动，同时也把教育体系内的竞争更直接地转化为家庭之间的竞争。可想而知，对于众多来自低收入、低教育程度家庭的学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学校的天平是不会向他们倾斜的。用时髦的学术语言来说，这是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差异的结果。学校本应“有教无类”，应以缩短家庭之间的差异为目标，然而今天的学校往往擅长“锦上添花”难以“雪中送炭”，反而扩大着家庭因素对儿童的分化，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

而学校竞争的终点，自然是大学。高考，映射着这个时代的悖论。今年的高考新闻中，有两则尤其幽默：一是湖北的某高考班集体打吊瓶输氨基酸备考（左下），二是广东某校高三学生打出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右下）。笑过之后，相信人们都会感叹



高考的重压对学生身心的摧残。然而这座万人唾骂的独木桥，也是社会中下层子弟在同占尽

优势的“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子弟的竞争中唯一还算公平的一条道路。如今，高考改革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而“集体吊瓶事件”无疑又一次坚定了改革者的决心。可是，我们一定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把招生权力完全下放到学校，彻底抛弃全国统一录取考试吗？据说，复旦大学试验自主招生以来，上海市区内教育薄弱的学区进入复旦的学生已经明显减少。不难预见，一旦高考的独木桥拆掉了，放手让各校自己修桥，那么一定是金桥、银桥、土桥、铁索桥、钢丝桥各色不等，而今还能与“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一争长短的平民子弟，以后只能在铁索、钢丝上羡慕金银桥上的平坦大道而感叹自己的摇摇欲坠吧。改革至今，社会贫富分化、阶层对立已经危机深重，教育体系——尤其是掌握着指挥棒的大学——难道不以缓和矛盾促进平等为己任，反而以激化矛盾、加深社会分裂、火上浇油为乐吗？

同学们过五关、斩六将、进入大学之后的教育状况又如何呢？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已经演变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今年开始，大学扩招已被中央叫停。然而，很少有人从过去十年大学扩招、毕业生求职难的现象中反省教育的方向性危机。毕业生难就业的现象被诊断为“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的问题，这也是二战后受“人力资本论”毒害的多数发达国家的通病。看似有理，然而，稍加咀嚼，就不免困惑：教育还有“过度”一说吗？这不是意味着，接受教育不一定是个好事，得根据受教育的“量”来决定，受教育多了，反而是个坏事。这个结论显然是违背常识的。谁都知道，教育的好坏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质”的区别。质的区别，不在于考试分数多了几分，特长多了几项，不在于毕业生的月薪有多高，而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事实上，大学毕业生就业危机是对教育目的的根本性错误的严重警告。教育之所以会“过度”，只是因为教育的意义和实践完全被经济的指标所垄断：个人的职业和收入、学校的排名、经费、设施和教师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GDP增长——这一切经济的目的取代了教育本身朴素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育人原则。“读书无用论”在底层社会再泛涟漪，也是容易理解的事情：人力作为资本，也许的确过剩了。在“人力资本论”的框架下才存在教育“过度”，否则，以促进身心健康、改造社会问题为宗旨的教育，如何会出现“过度”呢？！所以，问题并不出在教育的多少，而在于教育的目的：人本来就不是也不该成为资本！

中国高校一再与国际接轨，与世界一流大学比拼，引进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种种理论和经验时，时常以偏概全夸大“国际经验”中的优势，却很少严肃地直面国外经验和制度产生的问题。本期刊登两篇译稿，介绍美国大学体系的危机。美国的大学体系的确具有强大的活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观念不断侵蚀下，美国的大学校园亦千疮百孔。为了上大学，家庭和学生高积学债，而跨入大学校园后，从师资到课程到作业的安排以及校园文化，都在无声地兜售一个信号：学习是不重要的。商科、法律等职业学院门庭若市，人文基础学科不断衰减。大学教育的内容不断枯竭，学位越来越多地对职场筛选具有象征意义。为经济目的而进行选拔和竞争的教育功能——梅南德所谓的理论 1——日复一日地排挤着大学肩负的民主、公正、平等的社会使命——理论 2。盘旋在中国大学上空的幽灵也困扰着美国的大学——当然，那也许本来就是从美国进口的。

也许，中美大学面临的共同危机，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和审视“中-西”“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成为现代西方和东方共同的社会理想。然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西方国家对自由和平等价值的背叛和践踏。因此，作为一个曾经倍受欺凌的国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始终保存着对西方现代化的怀疑，从而留下了探索和创新本土经验的传统，希望向真正的平等和人类解放迈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这个传统中最重大的一次尝试，它一方面试图从教育、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缩小社会各阶层的差距，另一方面却又需要集中有限力量发展经济因而不断制造工农分化、脑体对立、城乡差别和官僚特权。在现代化道路的矛盾中，社会主义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平等、自由、劳动与尊严的坚持，和对特权、等级、剥削及不劳而获的拒斥。70年代，在薄弱的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状况被联合国高度称赞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今天的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民的医疗和健康状况却落在全球一百多名之后，与拉美非洲国家为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曾经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对自由、平等的坚持，今天，在国内国外的资本面前，却被简单地反诬为暴政、盲从、集体无理性！残暴的日本侵略军如今成为某些知识分子口中的“友军”，英雄的民族独立运动导致中国与民主和宪政失之交臂令人扼腕，曾经的死敌如今成为战略同盟，反对“三座大山”的政党如今在全球遍洒钞票修建孔子学院。什么是真相？谁来为年轻人解答？我们的教育体系显然没有太大兴趣为青年人“解惑”。但，青年人可以自己学习，解答自己提出的难题。

面对无数让人痛心的社会危机，香港理工大学的部分老师和研究生同学们自发组成了中国农村读书小组，回到历史，回到中国本土的现代化经验，为自己寻求真相。他们制定了严格的阅读计划，隔周集中讨论，并将本学期的八次讨论整理成为三篇文章，分别辨析1940年前中国社会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原因、以及人民公社实践的得失。从他们的讨论，我们将吃惊地发现，那个远去的时代要解决却未解决的平等和民主问题，在今天依然未能解决，而那个时代要防范的特权、分化、变质，在今天却已蔓延成为社会的毒瘤。本期特辟专栏，刊登他们的讨论，并同时刊登该小组集体翻译校订的《中国集体农业再评价》，为他们的讨论稿提供具体的研究证据。

刊登这些讨论稿和译文，不是为了翻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为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经验和想像。历史的说辞可以被文人颠来倒去，但现代社会对于正义、平等、自由的不懈追求，始终会穿透迷雾，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中传播下去。

亲爱的教育工作者们，我们大有可为！

《立场》编辑小组

2012年6月30日